

语言哲学与语言中的哲学

Languag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y in Language

刘宇红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语言哲学与语言中的哲学

Languag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y in Langu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哲学与语言中的哲学 / 刘宇红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305-12570-6

I. ①语… II. ①刘… III. ①语言哲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498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语言哲学与语言中的哲学
著 者 刘宇红
责任编辑 李 清 裴维维 编辑热线 025-83592123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人文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44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2570-6
定 价 29.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685951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语言哲学与语言中的哲学》序

语，人之言也。《说文》：语，论也。《诗·大雅·公刘》：“于时语语”，传：“论难曰语。”哲，人之知也。《说文》：哲，知也；从口，折声。亦作𡗗。《尔雅》：哲，智也。“哲、知”，皆从口。“智”，从曰（说也），曰从口。“𡗗”，从心，以心折之。折，断也，分也，析也。所谓“折衷”，即以心分析。心中有知、有断、有析，而言于外也。此为“语”和“哲”之原初关系。

毋庸置疑，语言与哲学、语言学和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一些语言学问题就是哲学问题，一些哲学问题就是语言学问题。语言学原理中就有哲学思想，哲学方法中就有语言论转向。一些哲学家兼语言学家，一些语言学家兼哲学家。

（一）本原哲学来自本原语言文字学

尽管如此，是否哲学就是语言学的先导？多年前写过一篇《东西方文化的本原差别及其分野》（李葆嘉，2001：315—356）。在该文第七节“希腊原子论模式与音素论模式的同构性”中写到：“人们通常以为‘希腊哲学是西欧学科之母’，而不知哲学是本原语言文字学和原始自然神话传说的智慧女儿。远远早于本原哲学的语言文字学，才是西欧学科之母。”

希腊本原哲学既是脱胎于自然神崇拜的“自然哲学”，又是



以屈折语的音素分析模式为基础的“物理哲学”或“分析哲学”。依据音素结合的继起性知觉,古埃及含米特人发明了“离素原则”,制定了最早的辅音符号(本原语言文字学)。与之语言结构相同的闪米特人,通过借用音素符号制订了辅音字母表。依据印欧语的屈折特点,希腊人又完善为辅一元音字母表,形成了把语音分析归纳为有限音素、由这些音素再组合成若干音节的“分析归纳—组合演绎”的思维模式。与之相应,“元素—原子论”把自然界分析为基本元素,用这些元素的结合与分离解释万物的生灭现象。

古希腊“原子论”哲学的创始人是留基波(Leukippos, 前 500—前 440),其传人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 前 460—前 370)提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的本义即“不可分的物体”,原子在虚空中彼此结合而形成涡旋运动,从中产生万物。在柏拉图(Platon, 约前 427—前 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前 384—前 322)以后,通过伊壁鸠鲁(Epicurus, 前 341—前 270)和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 约前 99—约前 55),古典原子论在希腊思想中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代学者仍然认为:古典原子论在许多方面是柏拉图之前的希腊哲学成就之冠。

希腊古典时期末期的语法学家普利西安(Priscian, 约 500 前后),在论述拉丁语史说:“正如原子集合起来产生一个个有形的物体一样,语音组成了像某些有形实体一样的语言。”(转引自罗宾斯,1997:30)虽然已经揭示出原子论与音素论之间的相似性,但未能正本清源。字母在前 9 世纪从腓尼基传入古希腊,而原子论则产生于前 5 世纪。依据先后顺序,是音素论模式促成了原子论哲学的产生。

(二) 语言结构类型制约着哲学体系

在文化相对论思潮的背景下,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方,出现了与“普遍唯理主义”相对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一假说的精髓可在赫尔德(J.G.Herder)和洪堡特(W. von Humboldt)的论述中找到源头。思想不可能不受语言的束缚,思维模式或思辨法则受制于语言的结构特征。语言和文化差别很大的不同民族,也就意味着生活在存在同样差异的生态环境和意识世界中。这些世界的形成和结构,不同于从欧洲古典传统承袭下来的“标准的普通欧洲人”世界,而这些差异在某些方面是与不同于屈折语的语形结构和语义结构相联系的,由此导致了对普遍语法和共同理性是否存在的质疑或否定。

如果不局限于欧洲和中国语言学的传统,或者要进一步探索欧洲语言学的渊源,就可以发现——世界上的语言研究至少存在四大古老传统:① 以音素离析和字母创制为特征的闪含传统;② 以形态归纳和逻辑句法为特征的希腊传统;③ 以形态分析和语音分析为特征的印度传统;④ 以语义阐释和因声求义为特征的中国传统。这些古老传统的存在表明,不同的语言类型与语言特征制约着不同的语言研究方法的自发产生和发展。(李葆嘉,2002)

同样,不同的语言结构类型也导致了不同类型的哲学的产生。德国哲学家茅特纳(F. Mauthner, 1902)曾说过的一句名言:If Aristotle had spoken Chinese or Dakota, his logic and his categories would have been different.(假如亚里士多德说的是汉语或达科塔语,其逻辑学和范畴论将完全不同。)

西方自然哲学的原子论与语音分析的音素论的同构性在于:① 因子性,事物由不可再分的基本单位构成;② 离析性,



这些基本单位之间可以相互离析；③ 组合性，这些基本单位之间可以相互组合。在西方文化中，世界的统一性在于事物的因子性，事物的多样性在于因子的组合性。中国的老子玄牝象结构模式与语音分析的音节论模式的同构性在于：① 意象性，通过意象认识事物的属性；② 整体性，单个事物是整体的、混成的；③ 孳生性，万物生于一，事物之间相互孳生；④ 类比性，异类事物之间普遍联系，可以连类而及。在中国文化中，世界的统一性在于事物的同构性，事物的多样性在于事物的孳生性。（李葆嘉，2001：315—356）

（三）新的语言学理论离不开哲学思辨

从语言学的发展来看，新的语言理论离不开哲学思维，或者说离不开当时的学术潮流。德国语言学在 19 世纪处于领先地位，是因为从 17、18，到 19 世纪，每个世纪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语言哲学家：莱布尼茨（G. W. Leibniz, 1646—1716）、赫尔德（J. G. von Herder, 1744—1803）和洪堡特（W. von Humboldt, 1767—1835）。

洪堡特（1829）提出：“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洪堡特，1999：50）。这一人文语言学思想，正是 19 世纪下半叶所形成的“现代语言学”思潮的基础之一。当然，“现代语言学”形成的更直接原因，是受到德国民族心理学和法国社会心理学的影响。也就是说，“现代语言学”是 19 世纪下半叶语言学研究的“心理学转向”的产物。（李葆嘉、邱雪玫，2013）。

（四）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离不开语言世界观

同样，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离不开语言学的启迪。希腊哲人

专注于讨论符号和符号所替代的事物是否具有同一性,因而产生了可知和不可知的迷茫。人类的可知是“不可知”中的可知,人类的不可知是“可知”中的不可知。从语言学家的立场出发,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可知”与“不可知”的界限,就在于是否存在以心智感受和经验框架为基础形成的语言符号,能用语言述说即已实现符号化的对象就进入人类的可知,反之则否。正是依据语言符号系统,人类才从不可知的混沌进入了可知的相对清晰。所谓“可知”,可以“知多”也可“知少”,可以“知真”也可“知伪”。除了可以借助语言符号来区分可知和不可知,也可借助语言符号来区分显意识和潜意识,凡是形成语义结构的意向就是显意识,反之则否。语言是意识与对象之间的纽带,语言也是对象与意识之间的面纱。语言在成为人们认知对象世界的工具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象世界与意识之间的隔膜。但是,人类不得不凭借语言的取景框来观察世界,从而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信息革命。(李葆嘉,2003:2)

根据洪堡特的观点,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就是语言中的世界,语言的边界就是我们认识的边界。

既然如此,我们对世界的分析就离不开对语言的分析。20世纪语言分析哲学的兴起,其渊源正是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

(五) 分清不同的“语言+哲学”

18年前,笔者曾想以“哲学语言学:语言的智慧”为题,写一本专著。1996年6月拟定目录,主体四章是:哲学的语言缘起论;语言本体哲学论;语言理论哲学论;语言方法哲学论。

其中的一个基点就是:厘清“语言+哲学”。区分出四个概念:①以语言文本(语言相)为哲学研究对象的“语言相哲学”



(philosophy of language),即西方语言分析哲学;②以语言学原理(语言论)来研究哲学的“语言论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③探讨语言学与哲学相互关系的“语言学与哲学”(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④用哲学原理和方法来研究语言学的“哲学语言学”(philosophical linguistics)。其中,“语言相哲学”、“语言论哲学”属于哲学,“语言学与哲学”属于学科关系研究,“哲学语言学”属于语言学。这种区分有助于对“语言+哲学”的深入认识。建立哲学语言学,有助于贯通语言学与哲学的研究,深化对语言学理论方法和流派的研究。

叶斯泊森(O. Jespersen, 1860—1943)的名著《语法哲学》(*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1924),系统阐述了语法学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该书初稿成于1910年,题名“英语语法导论”;1914年改名“语法基础”;1922年拟名为“语法逻辑”;最终,“或许有些自命不凡”地定名《语法哲学》。从“导论—基础—逻辑”到“哲学”的易名,反映出该书的逐步理论化过程。对语法现象要从哲学高度去审视,进一步上升到理论。该书序言题记是卢梭的名言:“即使对司空见惯的事物进行观察,也需要具有哲学的头脑。”我们常常抱怨“中国人出材料,西方人出理论”,即缺少这种哲学思辨。(李葆嘉,2008:191—192)

当然,我们是研究语言学的,不是专门研究哲学的。但是需要思考,哪些是语言学问题,哪些是哲学语言学问题?

比如“主语—谓语”,关于:①主语、谓语的定義;②主语、谓语的分析方法;③主语、谓语的內部构成,这些属于语言学问题。而关于:①主语、谓语这对范畴的出现时间及其学术背景;②主语、谓语这对范畴为什么在那时出现;③主语—谓语结构分析法的固有局限是什么,这些则属于哲学语言学问题。

古希腊语法学的研究重点是词法范畴,没有“主语—谓语”

这样的句法范畴。直到 13 世纪,思辨语法(Grammatica speculativa)或摩迪斯泰学派(De modis significandi)的学者才提出,语法中最重要的部分应是句法,在其论著中才第一次出现了清晰的句法结构理论,在句法层面提出了主语(suppositum)和谓语(appositum)这些抽象成分。中世纪后期的语法学家,已经运用词序来判断句子成分。通过这些努力,中世纪哲学家在语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得到认同,而且认为语法研究的理论基础属于哲学家的研究范围。19 世纪的一些学者,如特乌咯特(Thurot,1869)曾说:“经过对事物属性的缜密思考而发现语法的,不是语法学家而是哲学家。”(李葆嘉,2008:55—56)

如果一种语言有充分的形态变化,那么就不需要主语—谓语这样的句法范畴,依据词法范畴就可以进行句法分析。为什么 13 世纪要提出主—谓这对句法范畴,是因为此时的语言学家面对的不仅是拉丁语,而且包括一些形态变化不充分的民族语言。这些语言不能仅靠词法范畴,即形态变化来进行句子结构分析,而且需要依据词序判断句子成分,也就有必要提出主—谓范畴。不过,西方句子结构以动词为中心,因此主—谓分析法也就不适合不以动词为中心的句子结构。

既然主—谓框架在形态语言的句法分析中延续了 700 年之久,当然有其合理性。同样,既然主—谓范畴基于形态变化的一致性,将其套用于其他结构类型语言,也就难免局限性。认清了主—谓结构的由来及其性质,也就可能认识到西洋式主—谓结构的自恰性和汉语式主—谓结构的比附性。(邱雪玫,2013:92—99)

再如“原型(prototype)”,提出英语的鸟类范畴原型是“知更鸟”,这是认知语言学(包括认知心理学)的问题。但是讨论认知语言学确定的“原型”,其实不是真正的“原型”,而是基于



现有语言知识和体验的“典型”，则是哲学语言学问题。“原型”的要求严格，一类范畴只有一个“原型”成员，即“原型”具有原初性。必须基于“原初”成员的相关知识（可能涉及史前或早期文明）来建构其特征。由于原初成员的相关知识隐晦，认知语言学家认定的并非都是原初成员，通常是就现有语言知识或认知常识去确定某种语言中的某一范畴的所谓“原型”，其实仅是“典型”。（李葆嘉，2013b：37—38）

再如“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把这一问题作为哲学问题还是科学问题很重要。倾向于把这一问题作为哲学问题，则基于心灵主义，势必产生一系列的构想及思辨。所提出的观点可能仅只言片语，既不加以严密论证，也不一定付诸操作，任凭后人去揣度和争论。而倾向于把这一问题作为科学问题，则基于经验主义，注重语言事实的描写和阐释，其理论无疑要求具有操作性。根据这一分野，索绪尔本质上是一位基于心灵主义，或神秘主义的语言哲学家。（李葆嘉，1994；李葆嘉，2013a）。尽管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多年来学术界争论不休，但是有一个最终标准：一种理论是否有必要，要看它是推动还是阻碍学术进展。显然，既然“语言符号是任意性”，也就关上了研究的大门，阻碍语言符号研究的理论当弃之。

《语言哲学与语言中的哲学》的构思有三个基点：① 在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研究中的语义、语用和句法等问题；② 语言的功与过、语言的产生、语言的句法结构与功能、音形义之间的关系、指称问题、可能世界语义学、语用中的合作关系、语用悖论、语义搭配、符号学中语言哲学问题、双及物构式中的哲学规律等，都是语言哲学，也是语言学中不能回避的问题；③ 采用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但重心落在语言学领地上。该书不仅是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的有趣读本，而且对推动

哲学和语言学研究的相互借鉴有较大价值。

东亭 李葆嘉 谨识
2013年8月下旬于千秋情缘

参考文献

- [1]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
- [2] 李葆嘉.论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失误和复归[J].语言文字应用,1994(3).
- [3] 李葆嘉.东西方文化的本原差别及其分野[M]//理论语言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 [4] 李葆嘉.语言学的渊源、流派及其学科性质的变迁[J].江苏社会科学,2002(5).
- [5] 李葆嘉.中国语言文化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 [6] 李葆嘉.中国转型语法学:基于欧美模板与汉语类型的沉思[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7] 李葆嘉.试论静态语言学的神秘主义与吝啬定律[J].山东外语教学,2013a(1).
- [8] 李葆嘉.词汇语义学史论的壮丽风景——《欧美词汇语义学理论》译序//吉拉兹.欧美词汇语义学理论[M].李葆嘉,司联合,李炯英,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b.
- [9] 李葆嘉,邱雪玫.现代语言学理论形成的群体模式考察[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3).
- [10] 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M].许德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11] 邱雪玫.汉语话说结构句法学[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自序

过去几年,我一直给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开设“语言哲学”课程,陶醉于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人本主义哲学的深邃思辨,也时有感悟,这种感悟有的撰写成了论文,有的启发了更深层的思索与更广泛的阅读。

我自认为,在语言学研究中间,我比许多同行都更关注语言哲学问题,因为在过去几年里我发表了很多篇语言哲学的论文:《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观与马克思主义认知论比较》(《福建外语》2002年第三期);《认知语言学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一期);《认知语言学的理论缺陷》(《山东外语教学》2006年第五期);《隐喻研究的哲学视角》(《外国语》2005年第三期);《语言的功与过》(《山东外语教学》2007年第五期),等等。所以,我想把过去发表的与哲学有关的论文整理出一本书稿,这就是本书的设计初衷。

上面提出的部分论文,有的已经收录到《认知语言学:理论与应用》这一著作中,所以不再重复收录。

在哲学完成了语言学转向之后,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研究中的语义、语用和句法等问题,所以本书在内容上体现了哲学与语言学在研究范围上的一致性。全书分为六篇,即语言本体哲学、句法哲学、语义哲学、语用哲学、符号学哲学和语言中的哲学。每篇大约三至四章,涉及语言的功与过、语言的产



生、语言的句法结构与功能、音形义之间的关系、指称问题、可能世界语义学、语用中的合作关系、语用悖论、语义搭配、符号学中语言哲学问题、双及物构式中的哲学规律等等,这些都是语言哲学不能回避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哲学纯粹思辨的作法,但重心落在语言学的学科领地。在每一章节中,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附有大量的例句分析,所以本书相对于传统的纯哲学研究更加通俗易懂,是哲学、语言学、符号学和相关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有趣读本,对于推动哲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相互借鉴有较大的意义。

第一篇是语言本体哲学,第一章首先探讨了语言三方面的功,即交流思想之功、充当思维媒介之功和存贮知识之功。语言的过与这三种功紧密相关,即语言会说谎、语言决定思维和语言难以再现思维。最后,文章探讨了如何让语言改过立功的方法。第二章认为,通感现象为自然语言“音”(语音或音系)与“形”(文字)的产生提供了部分的发生学理据;同时,“音”与“形”这两种语言形式与“义”(语义内容)之间的相互确立同样体现了通感的功效。第三章认为,模因学难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甚至它的科学性也值得质疑。作为一个学科,模因学没有明确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没有自足的元语言系统和明确的理论目标,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有待廓清。

第二篇是句法哲学,从第四章到第六章。第四章在对 Token/Value 概念的定义进行简要评析的基础上验证了这组概念的心理现实性,对比了这组概念与 Identified/Identifier、decoding/encoding 以及 to be 所体现的时态对比对关系子句的功能分析,探讨了 Token/Value 与 Given/New 在功能分析中的不同之处。第五章认为成语仿用是成语构式的非常规使用。由于仿用后的成语在句法语义上不协调,所以构式必须

改变部分语素的句法语义特征,使之与构式协调,这一过程称作语义压制。在第六章中,我们主张汉化语音的音义联想激活了多个语义实体,使 PK 获得了更丰满、表现力更强的语义内容,这种语义优势是 PK 的任何一个同义词(如挑战、角逐、竞赛等)所不可比拟的,而且与拉丁字母 PK 的语义临摹很接近。合理的音义联想加上更丰富的语义激活是 PK 爆发式流行的内在原因。

第三篇是语义哲学,先以两章的篇幅分析了前指词语与先行词之间的句法特征、前指词语的形态特征、音系特征、概念相容性特征以及概念结构等方面对前指关系的类型进行了探讨。第十章认为可能世界语义学和心理空间理论不同的是两者在哲学基础和认识论上的对立。前者奉行的是客观主义,而后者以经验主义(或经验现实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

第四篇语用哲学对四个问题分别展开研究。语用学中的“合作”是一个框架,框架要素的置换一方面破坏了原有的框架,另一方面会促使听话人检索出一个适合新赋值的新框架,所以遵守也好不遵守也好都是合作。由于礼貌是一种普遍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所以当“更深层的合作”出现时,礼貌原则拯救了合作原则。“你是人还是东西”的回答悖论,是一个很有趣的语言学与逻辑学问题,从语义学、语用学、逻辑学这三个学科出发,可以解释悖论的症结所在。“差不多”与“差点儿”是现代汉语的常用词,两者概念结构的对比以及认知过程的格式塔策略可以解释两者的语用差异。“天使脸蛋”与“魔鬼身材”语义搭配的合法性和褒贬特性得到了语料库的支持,但考证语义搭配的合法性和褒贬特性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在首选搭配优先和效果最优这两条原则作用下,“天使脸蛋”与“魔鬼身材”的搭配合法性得以确定。



第五篇,即符号学哲学,对多种符号学理论从哲学的视角进行了分析。通过对索绪尔符号学和皮尔斯理论的对比,发现索绪尔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具备理论的统一性特征。对话理论对子句的人际功能、oxymoron 的语义结构、明喻与隐喻的解读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上海世博会口号的中英文版本在语言结构和语义转换上所表现出的大胆突破,很难用作者中心主义、文本中心主义或译者中心主义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是复调翻译的理念合理地解释了多种要素冲突与妥协的过程。格雷马斯将“功能”项(即行动元)结构化,形成了行动元模型,即符号矩阵,符号矩阵层级结构中的行动元遵循三条规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行徽都由多个符素或亚符号按一定的结构次序组合而成,它们在行徽内部体现为组合关系,并在行徽之间体现为聚合关系。从意指过程来看,古钱亚符号与银行服务之间的第一意指关系被一再借用,由此形成第二甚至第三意指系统,如果充分考虑不同意指系统的结构内嵌关系,那么行徽之间的雷同现象可以最大限度地被消解。

最后一篇,即第六篇,以双及物构式作为切入点,分析了具体语言现象中的哲学问题,它与语言哲学具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把双及物构式的意义确定为“损益关系”的表达,一方的“损”对应另一方的“益”,一方的“益”对应另一方的“损”,就能对所有的双及物句进行统一的无差别的分析,使双及物构式在理论上更具有连贯性。

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浮躁,越来越急功近利,理想、追求、信仰、学术被越来越多的人嗤之以鼻,甚至沦为被人嘲弄的笑柄。我忐忑地承认,我是一个异端,是一个对学术情有独钟的死心眼的学者,十数年如一日,在学术的天地里自娱自乐,也取得了一些成绩:200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限

定名词词组指称问题的认知解读》；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认知语言学：理论与应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专著《语言的神经基础》；2011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专著《隐喻的多视角研究》；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词汇与句法界面的双向互动研究》；2014年初，本书将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之所以醉心学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父亲，刘公讳号慕苏老先生。

父亲饱读诗书，文才横溢，有极好的古汉语和古文字根底，工于对联，偶尔赋诗填词。每逢十里八乡的婚丧嫁娶、盖房造庙、修桥铺路、集市店铺开业庆典、国家和当地的重大事件，父亲都要撰写一幅或多幅对联，要么是应人之邀，要么是自娱自乐。这些作品都是因人应景而撰，往往嵌入当事人的名字或当地景物的名字，用典精妙，气势磅礴，志趣高雅。信手抄录几幅，既资佐证，也算弥补父亲没有文字留传后世的遗憾：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悲痛，父亲撰联曰：

为恤民情，乃赴人间施政务

因为仙约，忽升天上正乾纲

1994年2月，纪念魏源诞生200周年：

一百卷图志，是谁家妙手天成？忆宝庆飞雏，杭州跨鹤，登进士于京兆，除牧伯于高邮。与龚氏齐名，声闻朝野；为裕谦划策，力挫侵陵。怀变古便民之奇才，展通经致用之大志。外资明治，内启康梁。师夷长技以制夷，发聩振聋，爱国昔曾垂典范。

两世纪风云，演故地桑田沧海。叹洪杨蹶踣，戊戌徒劳。虽起义乎武昌，卒合流乎宁汉。迨毛公肇造，扭转乾坤；赖邓老筹谋，恢弘业绩。作中华特色之设计，定改革开放